

名家访谈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谈工业遗产保护——

激活工业遗存，要增功能更要留记忆

■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陈瑜

“最小干预原则”在工业遗产保护中不一定总是成立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标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重要历史节点。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如今，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留住工业文明的历史乡愁？如何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记者就此专访了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

——编者



▲黄浦江 潘思同(1904-1980) 1962年作

文汇报：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就出现了“工业考古学”。1978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瑞典成立。工业遗产的价值是如何被认识的？

伍江：工业文化遗产的历史离我们很近，许多厂房仍在使用中，人们很难看到它的历史价值。直到20世纪末的欧洲，大量重要的工业基地被荒废，迫切需要转型，许多工厂用地因此被卖出去，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时人们才发现，如果照这种势头，工业遗产的消失速度非常快。今天，距离我们更远的农业文明，甚至狩猎采集文明，都能找到遗迹。工业文明如果它的物质载体消失了，以后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于是，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学者展开工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全球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H)，后来还有20世纪遗产保护研究会，把工业看作是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球共识。

文汇报：《世界遗产公约》在定义“文化遗产”时，提到了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这对于工业文化遗产也同样适用吗？

伍江：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三大价值在大部分工业遗产里很难完全“对号入座”。首先，工业遗产的科学价值需要专门研究。比如说，工业文明中有各种不同的工业生产方式，怎么确定哪个是最重要、最有名的？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价值也难以判断，如果说第一个“xx厂”还比较容易找到，但第二个、第三个要不要保护？此外，工业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也很难被广泛接受，因为它的建造几乎都是以实用为目的，缺乏非功利的审美考量。除了少部分艺术家或许能够欣赏，一般的人会觉得那些大烟囱那么丑，为什么要留着？

“转型”不能随心所欲，要看是不是城市想要的

文汇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兴起了工业遗产的“艺术转型”。旧厂房为何会与艺术家结缘？

伍江：世界范围内那么多荒废的工厂，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土地资源完全交给房地产业，最有可能的就是推翻重建。但问题是，我们不希望它们完全消失，那么房地产开发的这套机制就不宜全部引入。由于租金低，这些荒废的工厂吸引了许多艺术家的到来——因为他们要空间，又付不起高昂的租金。

最早，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SOHO区曾经是重要的工业基地，但随着20世纪纽约的金融化、现代化，工厂外迁使得这片区域闲置。艺术家喜欢这里地段好、建筑空间大。他们把这些工业建筑稍加改造后当作自己的艺术工作室和生活场所。开始没有人管、不收租金。但随着经济回暖，许多原工厂主有机会把这些厂房卖掉，他们得把这些“非法占据”的艺术家赶走。为此，全纽约的艺术家就要保护这些工业遗产。当然，这个“保护”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低成本的使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史。当时，他们的诉求得到了正面

的回应。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存在确实是有利于工业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所以，一个传统的工业生产空间就很自然地转化为现代创意产业的空间，工业厂房既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也是新兴产业的载体，两者就合二为一了。

文汇报：工业遗产的蝶变，证明它们可以是城市的文化富矿。唤醒“沉睡”的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中国是怎么上演的？

伍江：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上海，大量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但一些项目在开发过程中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并就此搁浅。最后，也是以很低的价钱暂时外租作为临时用途，这时大量的艺术家开始进驻，除了价格便宜外，他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美国艺术家都喜欢在厂房，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原身为上海春明粗纺厂的MSO创意园就是这样兴起的。

文汇报：上海春明粗纺厂从本世纪初开始向艺术创意园区转型。而从2003年到2008年，您时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能否为我们介绍下当时这些工业建筑改造的具体规划情况？

伍江：我03年进入市规划局，直接参与这一讨论。我们当时就提出，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不合法的，因为土地功能转换必须经过“招拍挂”。但这样的话，哪里还有什么创意产业？哪里还有什么艺术家？他们根本做不起。所以当时打了一个“擦边球”，我们提出“三不”：不改变土地的规划性质，它还是工业用地；不改变土地上的房屋结构；不改变房主的权属关系。但是鼓励重新利用，把新的功能引进来。到今天为止，这还是有争议的，现在你开画廊做艺术产业，大家还能接受，但开咖啡馆开饭店，大家就好像很难接受。

其实，工业遗产的保护本身就意味着它不能“随心所欲”，把土

地看作是一张白纸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它有许多附加要求，这些都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是冲突的。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再来思考在这些旧厂房中生长出来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乃至于餐饮行业，到底是不是这座城市想要的。如果是想要的，那就说明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有问题，应该调整政策。这是我和当时上海大部分决策者的观点。也正因为这样，上海在工业遗产再利用上的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5年前后，上海已经有了100个左右的创意产业园区，其中85%以上是旧工业厂房的再利用。也有新造的，但都不成功，艺术家不愿意进去，反而是旧厂房改造的都成功了。

油罐或变剧场或成住宅，关键是要留住“乡愁”

文汇报：从政策方向来看，《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工业旅游项目，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街区)、创新创业基地等。上海在工业遗产建筑再利用方面利用率较高，但也有学者认为，利用类型过于单一化。对此，您怎么看？

伍江：确实，你很难想象上海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变成美术馆。还是要开动脑筋，把各种各样的新功能加进去。我个人认为什么样的新功能都可以加进去，但前提是你要认识到这里是上海历史上重要的工业发展的记忆，必须留住。在这个前提下，就需要寻找既可以保护它，又能够跟你植入的新功能相容的交集，才有可能让它活在当下，活在未来。比如，我们的油罐可以变成一个剧场，事实上国外的油罐变成住宅的也有。

最近我去青岛考察四方机车厂，它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造火车的地方，现在也是主要的高铁基地。旧址上都是100年前的厂房，怎么办？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打算在旧建筑之间造一些跟工厂的功能转型直接相关的新建筑。比如说，有些原来的厂房，被改造成高铁的研究所和展示厅。还有一部分经过改造成了服务于附近社区的公共设施，比如小学、中学、幼儿园，还有菜场等等。与此类似，在上海，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能不能最大可能地把当年工厂的那些建筑、生产的工艺特点，最大程度的保留下来，让后人还能够感受到当年这里的样子。比如当年的上海第一钢铁厂是什么样子。同时又把新的开发融进来，里面不乏有大楼有办公，有新的文化功能，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上海一个新的亮点。

文汇报：对工业遗产的利用不只是卖情怀、卖文化，您所要强调的是，在赋予工业遗存当代价值的同时，也要保留当时的社区记忆，让人们看得见乡愁。

伍江：是的。其实所谓的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保护，不仅是我们学术界讨论的事情，它事关每一个人。当时我在市规划局的时候，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建议信，有很多专业的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投诉，说哪哪被破坏了。但令我触动很大的是一位杨树浦电厂的工人，他说你们不能把工厂的大烟囱拆掉，拆了我们的记忆就没了。他说我已经退休了，烟囱现在也不用了，但是它是我们所有杨树浦电厂人的一个念想。所以，专业学者讨论一栋建筑的价值是什么，从理论上讲大烟囱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记忆。就像在家里面，如果去世的老人的东西都没有了，也就谈不上记忆了。虽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着，但你总是要留下点什么，给自己一些念想。

荐读

《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美】奥兰·扬 著，杨剑孙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该书的核心命题是解决人类世的问题需要创建并实施具有创新特征的引导机制。扬认为，目前以规划和监管为主的治理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复合系统治理的需求，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工具箱”，添加新的方法来回应治理的需要。新的治理机制具有足够的持久性，以有效地指导行为；并具有足够的敏捷性，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在这本书中，扬将对人类与自然系统的关注和对社会制度的关注结合起来，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为人类世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思考角度与实践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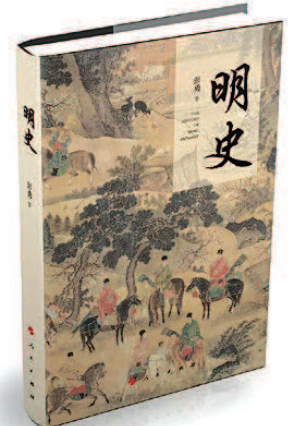
《何为真正生活》(【法】阿兰·巴迪欧 著，蓝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哲学家如何理解青年？又如何理解“真正的生活”？青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好的阶段，还是人生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而你会选择在彼时燃烧生命，还是构筑人生？如果可以，79岁时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会对年轻人说些什么？也许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谈起更引人深思。在这本语出蓝谈“真正的生活”的作品中，阿兰·巴迪欧指出，“真正的生活并非不存在。或者说，它并非完全不存在”。



《明史》(彭勇 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

有人说，明代的历史充满了暴力、专制、独裁，充满阴暗、另类与变态，明代的恐怖社会宛如人间地狱；有人却说，明代的历史洋溢着睿智、新奇和文明，它开启了近代中国民主社会的新纪元和新时代，如果能够穿越历史，他们更愿意生活在明朝时代。迥异的观点似乎各有证据，却让人莫辨是非。明代是中国传统帝制的继续，是传统帝制走向衰败的开始，也是孕育新时代、新生活的时期。在明代，垂死与生并存，腐朽与神奇共生，有机遇，有挑战，明代的历史异彩纷呈、多姿多彩。



锐见

“夜间经济”的六种消费主体

■ 晁钢令

据银联统计，2018年上海“晚7点至次日晨6点”的夜间消费规模已高达5253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当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1%。上海“夜间经济”的不同模式，共同构成上海的“夜间消费生态系统”。从夜间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看，大体上可分为6类消费群体。

【夜生活迷恋者】基本上是90后、00后。晚8点到凌晨2点是一天中他们最为疯狂和享受的时间。酒吧、迪厅、卡拉OK是主要光顾的场所，注重场景的情调和特色，消费地点相对稳定。

【国内外旅游者】他们对城市观光景点特别感兴趣，也会光顾一些著名商场、夜市和娱乐场所。一个城市具有特色的品牌商场、夜市

和娱乐场所是吸引旅游者夜间消费的关键要素。

【工余逛街购物者】基本上是本市居民及在沪工作的上班族。他们休闲逛街之际，即兴购物也经常会发生，主要是对那些价位不高、但设计新颖而富有冲击力的商品。

【文化艺术休闲者】如观赏夜场电影、戏剧或音乐会的观众们。除此之外，参观博物馆、展览会，进图书馆、逛书店是他们的主要选择。带着孩子汲取间文化也是一些家庭的时尚。

【社交商务群体】往往会根据社交活动和商务活动的对象和内容选择消费场所氛围和消费档次。又可分为注重实质效果的活动(如商务洽谈)和注重形式效果的活动

(如朋友聚会)。

【夜间加班工作者】他们中间有白领、教师、记者、主持人、文艺工作者，也会有警察、保安、出租车司机、公交职工和环卫工人。他们对宵夜的品质、档次、服务方式有所不同。

我们大体上可根据二个维度将他们分为四种主要模式。一个维度是“内容-场景”，其反映了夜间消费群体所关注的消费客体的侧重点，另一个维度是“物质-精神”，其反映的则是夜间消费群体主观上的需求。四种夜间经济的模式：享受型、保障型、促销型和意义型。

享受型。参与者注重“精神”满足，关注“场景”体验。绚丽夺目的城市灯光夜景、五光十色的酒吧、

歌厅等都是其主要载体。针对此类需求，应规划好主要的夜间娱乐商圈，创新内容，提升品位，并加强管理。在强化圈内场景氛围的同时，严格做好与居住区之间的隔离，以防扰民。

保障型。参与者主要是商务人士、夜间加班工作者和部分居民。他们以“物质”满足为主，关注消费的“内容”。夜排档、便利店、深夜食堂，甚至一些无人售货设施等都是其主角。因此除了对居住区、商务区加强各种便利型商业设施的配套完善之外，还应当考虑到对一些办公文化用品和其他应急用品方面的夜间供应网络的布局。

促销型。在夜间逛街购物的消费者大多是无明确的购物意向的。而购物中心、专卖店，甚至是一些

夜间市场的现场促销活动往往会引发其中不少人驻足购买。可以考虑在一些主要商圈，结合一些文化活动开展区域性的联合促销。

意义型。参与者主要追求“精神”的满足，重视消费对象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目前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电影院、演剧场等是其主要代表。当前应当根据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要，包装和宣传一些概念，让已有的一些“内容”资源能开发出更强的“意义”价值。

只有明确了“夜间经济”参与者的不同需求，调整好“夜间经济”的供给和布局，才能使上海的“夜间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